

2016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论坛

论文集

凯里学院 贵州省社会科学学院
吉首大学 贵州省人类学学会
中国·凯里

2016年10月8日

保护·传承

农耕文明与传统村落保护·····	杨庭硕(1)
贵州民族特色村寨的主要特点·····	罗剑(9)
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	省社科院(16)
黔东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思考···	李斌、谢景连(24)
关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几点思考·····	梁启俊(29)
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罗康智(35)
都柳江文化走廊民族乐舞彰显古越遗风·····	吴媛姣、蒙爱军(47)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范生姣(58)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传统侗寨的村落保护·····	张宝元(66)
乡村酒宴的人类学研究·····	吴寒婵(71)
清水江文书村落原地保护模式的意义和对策·····	龙泽江(77)
生态文化视野下的古村落保护研究·····	吴合显(83)
黔东南岜沙村村落保护规划探讨·····	吴学成(92)
苗族岩寨村落结构及文化形成研究·····	杨东升(96)
村落视野下的“苗疆再造”·····	王 健(103)
传统村落保护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麻勇恒(113)
论侗族传统村落保护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傅安辉(120)
生态博物馆的传统村落保护问题反思·····	刘宗碧(130)
水族传统建筑营造技术·····	陈继奇(138)

城市化背景下传统村落婚俗的传承与保护.....刘月红(144)

开发·利用

多彩和谐论.....杨志强(155)

“绿色设计”理念下的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王 文(157)

社区营造视野下的侗族聚落遗产研究.....罗康隆、麻春霞(158)

贵州锦屏平鳌苗族与杉木的文化协同演化初探.....耿中耀(169)

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之思考.....王雨容(177)

传统村落的现代性.....吴秋林、王金元(182)

打造马家寨精品旅游文化长廊的构想.....李晓军(190)

黔东南州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优势及建议.....

.....李权、张惠敏、李瑞军、彭开起(198)

旅游语境下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罗永常(203)

农耕文明与传统村落保护

杨庭硕^①，耿中耀^②

摘要：此前的民族学研究，将人类历史上依次出现的文明形态大别为五个类型，分别称为狩猎采集文明、游耕文明、游牧文明、固定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前三种文明形态由于受生产方式所限制，其生存方式大多具有游动性，固定农耕文明则不同，由于人类的生产方式被牢牢的固定在有限的耕地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居生活，固定的居民村落也就因此而产生。以至于当代所称的传统村落，大多定型于固定农耕文明，而中国恰好是世界上耕地农耕类型文明最为发达的国度。因而，当代中国村落其间的样式也最为多样，不过，中国的村落又会因为地域和生计而有所区别。具体到我国西南地区而言，由于传统村落定型的背景差异较大，因而，传统村落的内在结构差异也十分明显，有的是以农田的高度稳定而得以定型，有的则是以当地特殊产品的定型形成特殊的存在结构，有的则是以古代交通道路的走向和集市定型而产生，也有的是因地方政治中心的形成而造就了特殊的政治色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为此，要有效的对传统村落实施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显然需要深入探讨不同民族村寨得以定型的文化生态背景的差异。因为，这是传统村落得以稳定延续的灵魂所在，只有掌握其灵魂实施保护，相关对策才具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才能落到实处。

关键字：农耕文明、文化生态、传统村落

一、传统村落从无到有

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形态被学者们称为狩猎采集文明。在该文明形态下，人类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需要跟随季节的变化在不同的地点从事不同的狩猎采集活动，以获得生活和发展的物质需求。由于人类狩猎采集的对象在空间分布上各有其规律，而不可能相互重叠，因为，随着季节的变化和狩猎采集对象的年季丰度的差异，相关人群还不断的更换狩猎采集的地点和路线才能获得理想的收获。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要建立固定的村寨聚落，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过，所谓“居无定所”决不能理解为随心所欲的搬迁，其理由在于，人们如果不掌握狩猎采集对象的生活规律及生物属性，有效的狩猎采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既然要随着狩猎采集的变化而调整人们的生存方式，因而这样的调整也是有规律可行的。其结果必然意味着，村寨虽然不固定，但人们活动的方式确实有规律可行的。换句话说，当时的人们总是在最大限度的遵循规律的情况下，实施有计划的搬迁，每到一定的地域都会建立起临时性的村落，这些村落与当代的区别仅是不具有稳定性。但他们在什么地方定居多久，却是有规律可行的，而不能曲解为他们随遇而安过着四处游荡的生活。此前，一些学者将这一文明类型下的人们称为“游动队群”显然有违实情，只能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一个比喻性的表述而已。既然在该类型文明形态下不能形成稳定的村落，今天所推行的传村落保护当然就

^①作者简介：杨庭硕，吉首大学终身教授。

^②作者简介：耿中耀，吉首大学博士研究生。

不能将其涵盖。

游耕类型文明是在狩猎采集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在这一类型文明中，人们不仅开始从事有目的的作物种植和动物驯化，而且其种植和驯化的物种开始相对集中到有限的某些物种之上，这就为人们认知和掌控这些物种提供了可能，从而为单位面积的产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社区所拥有的人口规模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生息地也实现了较大幅度的稳定。然而，由于人类对自然风险的规避很难实现高度稳定和有效，因而其居住地同样需要做有规律的搬迁，以此规避不可测的自然风险，最终都会导致在该文明类型下的人们每建立一个村落通常只是一到数年不等。对于那些风险较少的地区可以长待数十年之久，但一旦遭逢自然的不测或意外的社会打击，村落就得放弃，另外选择有利地段，再建新居。就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所称的传统村落保护，当然也不应将这一类型下的村民聚落纳入保护对象。

对该文明类型下的居民聚落实情，历史学和民族学可以分别提供互有差别的资料，足以帮助当代的人们正确认识这一类型下的居民聚落特点。我国是一个文献大国，历代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凡属先秦文献都明确提及很多古代的王朝和诸侯王国，其都城需要不断的搬迁，据传说，夏代的都城搬十八次之多，商代则搬了六七次，直到盘庚迁都后才基本定型，但与此同时还拥有数量不等的临时都城，这就从中证明，即使是国王的都城都还没有处于真正的稳定状态。周代以后，随着王权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都城才最终得以固定，但周朝也将都城从西安迁到洛阳，从而被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

当代的考古学对夏朝都城的研究工作已经历了一百年的时间，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记载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认定，夏朝最早都城地处陇西的齐家文化分布区内，中期都城位于河套内的石茂文化分布区内，晚期的都城位于黄河南岸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通过发掘进一步表明，当时的都城内不仅建有王宫和居民住所，还拥有耕地和临时放养牲畜的草地，当然也有各式各样的作坊遗址。这就表明，当时的国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聚落，它同时也作为生产聚落，生产区和生活区在都城内同样会发生相互置换，都城尚且如此，普通民居其可变程度就不难想象了。安阳殷墟的考古遗址发掘已经取得重大的突破，表明当时的王国聚落已经高度稳定，然后城区内仍然拥有牧场、耕地，依然保持游耕类型的特点，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王室墓葬还分布在皇宫附近的城内，当时土地使用的相互置换由此获得了一个特征，表明城区结构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度稳定。

与此同时，先秦诸子的治国论著也多次提及，居民生活中有计划搬迁和生产生活节律有规律的搬迁，《孟子·梁惠王》提到，国家遭逢灾难时国王要将居民从黄河西面迁到黄河东安，或者从东岸到西岸，这就是成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典故出处。此外，如《庄

子》、《荀子》、《韩非子》诸书都同样提及当时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同的季节要从事不同的劳动，既要耕地种桑养蚕，又要采伐木材修建住房，这些生产和生活实情都与真正的农耕不相同，人们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定居在同一个村落之内，而是要随季节做出相应的搬迁。因为学者称为这种类型为“半定居性”生活，这样的事列在《史记》中获得了有利的历史证据。表明在游耕类型的文明之下，稳定的传统村落很难定型下来，因而今天讨论传统村落的保护时对这样的“半定居村落”最好不纳入传承保护的对象去加以对待。

当代的民族学通过对游耕类型文明的活态形式的田野调查表明，村落的搬迁不仅经常化，而且有规律可行，比如二十四季的田野调查表明，很多苗寨都有新老寨之分，且共用一个地名，有的老宅废弃后，当地居民还要定时到老宅祭祖，至于具体搬迁的实情有关资料的记录更其详实，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还要搬回到此启用居住，类似情况不仅苗族，还包括傈僳族、瑶族等诸多民族。这就足以表明在游耕文明类型下，迁移无衡、迁移无常是其居住的常态，这样的事实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在这样的类型下，稳定的村落是很难传承下来的，实施活态的传承保护也就无从谈起了。

游牧类型文明是在综合狩猎采集文化和游耕文明的长处和发展而来，在这一文明类型下，人们能高效掌握大型食草动物，从而获得了物质生活的稳定，人们也为了获得稳定的生活而不得不随着牲畜的迁徙。据田野调查可知，山羊和绵羊一天内的觅食半径要达到三十公里，马则达到八十公里。当牧场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人就必须和牲畜一并迁徙。为此，人类不可能安定下来，只能以帐篷为家，为的是方便随牲畜迁徙。进一步的田野调查表明，处于游牧类型下的我国蒙古族、哈萨克族、彝族等通常都要随时准备着随季节迁徙的预备条件，如蒙古族通常都准备不同季节的牧场，他们随着牲畜一年四季不断的搬迁，哈萨克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冬季到戈壁滩搭建帐篷，夏季到高山、森林和草地去放牧牲畜，春秋两季则是在坡面草地上放牧，类型的习俗在彝族中也可以看到。因此，既然这些民族不能建构固定的住房，那么稳定的传村落也就无从谈起，传统村落的当代保护理应不能将其包括在内。又据文献所记载，中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的游牧文明都城也具有鲜明的可移动性，历史上的辽朝是由契丹人建立的王朝，该王朝的都城分布建立在东、南、西、北、中等不同地域之中，皇帝不会定居于某一个都城中，而是在不同都城之间轮流居住，而且还带领官僚禁卫军等从事“纳钵”，也就是季节性的游牧和狩猎活动。当代考古进而证明，辽国都城的王国建设也要仿效毡房的形式去修建，王宫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生产生活遗物也具有鲜明的轻便特色，为的是方便搬迁之用。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今天我们所说的传村落显然不是上述三种文明形态的产物，而只能是固定农耕文明的结果，为此，要实现当代的传承和保护，关键就得弄清楚这

些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归属，准确的区分其村落形成的样式差异，找准传统村落稳定延续的自然与社会基础，有效的传承和保护才能落到实处。

二、传统村落的样式差异

固定农耕文明的最大特色在于实现了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因而不需要不断变换居住场所。这就为稳定村寨的最终定型奠定了文化生态基础，今天我们所能展开深入研究的传统村落也才因此而形成。然而，固定农耕类型文明，其内涵极为丰富，由于耕地的自然属性不同，作物种植的物种各不相同，耕作体制和制度保障也将随之而异。这样一来，不仅在社区内人们出现了明显的分工，而且传统村落的生存基础也出现了分化，这就使得不同的传统村落其得以定型的社会和自然基础各不相同，为了加以准确的区分，显然需要将传统村落划分为各不相同的样式。以下仅就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事例展开深入探讨。

农田密集型的传统村寨。在固定农耕文明下，人们都要靠固定农田为生，一个家户的生计都被固定在小块的耕地上，以至于耕地的大小直接决定着村寨规模的大小。其中只有那些村寨村落较大，自然与生态背景又相对稳定的村寨才能延续数百年之久，从而成为传统村落的典型。比如，从江县的车江大坝，地势平缓、水源丰沛，非常适应于糯稻种植，当地侗族乡民凭借这一优秀，健全和完善了稻鱼鸭农业体系，而今这一体系被认定为优秀的农业文化遗产去加以保护，由此看来，要保护好这样的传统村落显然需要从该村寨的根基做起，不仅需要对传承下来的村寨加以保护，还需要对其生计加以保护。这样一来，要将该村寨稻田、牧场等所有的东西一并加以保护，否则，村寨的所依存的根基消失，保护就会成为无本之源，徒有躯壳。这将意味着，要保护好传统村落不能见物不见人，只关注村寨建筑、村寨设施，而不关注人及生产基础。在这样的错位的认识下，即令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保存下来的也只是躯壳，而不具备稳态延续的能力。因为，正确的保护需要将传统生计及文化捆绑起来一并加以考量，才能找到有效的保护对错。只要方法对，即令国家投入不多，传统村落的保护也可以落到实处。具体做法应该是依据当地乡民所具有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通过市场机制去获得报偿，使村民的生活能够相对富足，焕发他们保护村落的激情，真正做到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激情与创新的结合。

清水江流域在近六个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杉树林种植的飞速发展，一大批苗族和侗族村寨也随着而定型，并传承至今。锦屏县的文斗、平鳌、加池、九寨都因此而定型，时至今日，这些村寨无一不拥有连片的杉树林、稻田，还拥有煤薪林、牧草场等，但要做好这样的传统村寨保护，关键在于整形其传统产业，并使之与现代市场接轨。事实上，用材林业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产门类，世界上有不少工业文明的国度至今还能仰仗林业获得发展

的空间和机遇，芬兰和加拿大就是其中的典型，葡萄牙则是仰仗茎皮栎产出的软木外销而获取巨额利润，林业种植也就成了该国经济支柱之一。中国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代的中国也不是简单的满足于三合板的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木材尚且具有较大发展空间。这样一来，林业如能够在现代化背景下实现创新，当地村民就可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了。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保护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保护。

除了用材林传统村寨外，桐油、生漆等传统林业产品的产出也造就了一大批传统村落。镇宁县的良田，三穗县的桐林，历史上都因盛产桐油从而做到富甲一方，赫章县的台神因盛产优质生漆而闻名遐迩，锦屏的小江九寨因盛产樟脑粉而盛极一时。但问题在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化学物品的大量运用先后挤占了上述传统产品的市场，相关村寨也沦为贫困村寨，这样的村寨，就算给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生态文明大背景下，集合这些村寨所拥有的文化生态优势，实现现代化的创新，凭借这些生态产品的外销和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弦易张，才能让这些村寨重返辉煌。这些乡民一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他们也才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存在，也才有保护的激情，一旦获得这样的优势，这些村寨的传承也就事半功倍了。

事实上，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大国，我国拥有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不胜枚举，茶叶、蚕丝、猪鬃都曾是贵州传统村寨外销获利的生态产品，由此涉及到的传统村寨可达千余个。而时下最紧迫的任务正在于，如何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去推动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复兴，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传统村落的保护不仅可以获得物质保护，还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持，传统村落的保护也就可以落到实处。

商贸集散性的传统村寨。在农耕文明的大背景下，由于名特优产品的产出互有区别，为了丰富人们的生活，商贸活动在历史上从来没中断过，很多名特优产品不仅成了贡品，还成为现代市场的抢手货，还可以打入国际市场，上文提及的桐油、生漆等就是如此。于是，在比邻古代交通沿线的村寨，甚至可以将农耕畜牧视为副业，而将商贸视为主业，这样一来也形成了另一个样式的传统村落。比如，清水江林木贸易的繁盛造就了卦治、三门唐等传统村寨，这些村寨本身种植杉树不多，但是所有的杉木外销都要从村下的清水江穿行而过，大宗的元木贸易要在这些村寨实施规模性的拍卖，还需要扎排外运，以至于在历史上上述村寨的存在，无论是村民当水夫，还是提供饮食服务，都可以获得极大的满足，最终使得这些村寨不仅闻名遐迩，而且其建筑配套设施完全，居民的舒适程度也高于周边各村寨。当前，此类存在面对的困境在于，随着林木贸易的下滑和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林木采伐锐减，贸易量

也锐减，这些村寨不仅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而且乡民也沦为贫困境地。不少人为了谋生而外出打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即令投入巨额的资金和人力，但要保住这样的村寨恐怕终将于事无补。要保护这一样式的传统村寨，关键是要正确的使传统林木贸易实现现代化转型。即令重新成为林木贸易中心不大可能，但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用材林产品的复兴，这样的村寨完全可以转型为生态旅游目的地，而赢得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同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传承和保护思路。

关岭县花江镇元明清三代设置过暮役长官司，由于该长官司地处滇黔交通要道，同时背靠优质牧场，因而这里一直是黄牛、乌蒙马的集散之地，周边村寨也因此而富甲一方，留下的传统村落也多达十余处。当前，此类村寨的传承与保护需要对面对的困境在于，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日新月异，马匹的销售已经淡出了市场，桐油的利用也被化学涂料取代，黄牛的销售落到了中间商手中，再加上，此前一段时间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畜牧业受阻，花江传统村寨也走入低谷。不过，这些传统村寨并未走入末路，随着全国人口生活的提高以及对肉食的巨增，黄牛、马、羊等畜牧产业必将迎来新的一春。有鉴于此，保护此类传统村落不能把问题看死，而应当多一份预见，只要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得以复兴，当地各民族的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的集贸中心，完全可以凭借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而得以批量的拍卖和外销。这批传统村寨完全可以搭上现代化的便车是时代潮流的推动而重现辉煌。只需要做到这一步，这些传统村落的保护同样可以获得物质精神的保障。

行政中心型的传统村寨。元明清三个王朝在大理开发西南地区的同时，也必要要在不同的地区分别建设各级各类的行政建制和军事设施，而依据于此建立的传统村寨同样为数不少，多达数百处。而今，时过境迁，相关传统村寨其地位也就今非昔比，但往日的辉煌依然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相关的地上地下文物也等待着人们去挖掘认识，充满历史纪念的文物不胜枚举。对这要样的传村寨，只要改变思路，将他们与旅游相结合，他们也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安龙县在明末曾充当永王朝的临时国度之用，因而，在当地村落中尚有很多文物古迹，流传至今的依然不少。今天将它作为历史名城去创新利用其文物古迹，使之形成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旅游目的地，不失为传统村落保护的可行措施。

贵阳市花溪区的高坡乡，在明清两代也是作为长官司的衙门所在，其衙门至今尚存，但已多年无人问津。时下，如果将这样的文物加以创新利用，那么死的文物也就获得了现代意义的价值。相关传统村落的保护和传承也就不成问题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岑巩县都素村在明代初时作为思州安抚司的衙门所在地，改土归流后又是田氏家族的封地，田氏后裔长期充当为当地土同知。因而，留下的文物极为丰富，将此开辟为土司遗址的旅游目的地，同样大

有可为。元明清三代的军事设施为数众多，其中一部分发育成了今天所见的传统村寨，比如明代建制的湖南靖州卫所辖的一个千户所就位于今天天柱县的县城，县城周边的雷寨、织云都是该千户所的设防区。明代后期将该千户所的设防区改建为天柱县之后，县城就一直发生争执，摇摆于两地之间，由此留下的遗物至今尚存，同样是可以实施旅游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再如，龙场旧州是奢香九姨的旧址，同时也是王阳明的流放之地，目前该地已经成了旅游胜地，只需要作进一步的发掘和再认识，其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提升。如此来看，只有做好和这样的配套工作，相关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同样做到事半功倍。

有鉴于上述，展开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显然需要分门别类，不能一概而论，显然需要针对其形成的根基去规划传承与保护对策，而不能仅保护其躯壳，而忽略其精神。望学界同仁多加留意，绝不能见物不见人，决不能将文化与生态孤立起来，而应当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保护作为一个整体去对待，传承与保护才能具体化，精华化，成效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结论与讨论

实施传统村落的保护应是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传承与保护的原则必须确立为活态保护和传承，必须给被保护的传统村落赋予现代化的活力，使其文化经济处于可持续发活态运行状态，传统村落保护才能落到实处。必须牢记，仅仅保护建筑设施是远远不够的，理由在于，任何建筑社会都需要人去展开维护，去展开利用才是活的村寨，而不是博物馆中的古董。因此对不同样式的村落，理应使用不同的保护措施。需要将现代化的潮流和市场需求作为导向，去推动这些传统村落的现代化创新，传承与保护才能与现代社会接纳，乡民也才有激情。为此，以下三个原则值得借鉴。

其一是，传统村落的传承与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保护一并打包，实施整体性的规划整合，绝不能见物不见人，不关注当地村民的实际和现代化要求。其二。任何传统村落都有他诞生和发扬光大的历史机遇和成长路径，这些传统村落的衰败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因而传统村落不能一概而论，要针对其衰败探寻其脱困的措施，无视历史传统，不发掘其历史底蕴，片面实施见物不见人的保护措施，肯定是一种保护与传承的失策。其三，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村落同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由于他们诞生于前工业文明时代，这些传统村落的物质保障完全符合生态产品的要求，对维护现代人的身心健康也可以发展直接的作用，其历史积淀也可以提供丰富的精神享受。因而，传统村落的传统与保护，要立足于生态文明的高度开展此项系统工程，需要赋予这些传统村落现代意义上的存在与延续的价值，需要将他们转化为服务于文化生态的

财富，只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聚合村民的内生动力，使他们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和依赖力量，再加上政策优惠和舆论导向的支持，制度性的保障，传统村落的传统与保护就不再是一个难题，而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上述三项原则只要落到实处，传统村落就可以获得现代化的可利用价值，传承与保护就可以做到水到渠成。以上三大原则，实属必不可少，缺一不可，有关事宜，还望学者同仁深思，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贵州民族特色村寨的主要特点

罗剑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贵阳 550002)

摘要: 贵州是个多民族省份, 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 形成了众多类型不同、风格迥异民族特色村寨。总体上呈现出自然环境优美、民族古寨众多、建设因地制宜、民居风格各异、建筑工艺精湛、文化积淀深厚等鲜明特点。

关键词: 贵州、民族、村寨、特点

贵州历史文化悠久, 早在五、六十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在贵州这片高原土地上繁衍生息, 创建了贵州的史前文化。考古发掘证明, 贵州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在贵州黔西县发现的观音洞文化遗址与北京猿人同时期, 是我国长江以南最早、材料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已经发掘的旧石器文化来看, 贵州在早、中、晚三个时期都有典型代表。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原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遗址都有发现。贵州旧石器文化分布很广, 从黔西南到黔西以及黔北这一大片地区, 都是旧石器文化的分布区, 也是贵州少数民族祖先的活动区。历史上, 贵州又是古代华夏、氐羌、苗瑶、百越和濮人五大大族系交汇的地方。五大族系长期交往结集的历史, 形成了贵州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由于民族分布、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不同, 特别是喀斯特高原地理环境的封闭性, 构成了类型众多、风格迥异民族特色村寨, 出现了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文化面貌。使贵州成为民族特色村寨众多、特点最为鲜明的省份。每个民族村寨, 由于大山阻隔, 都有独特的文化风貌, 一个个风格各异的民族特色村寨, 就像多个文化孤岛组成了贵州文化千岛的现象。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又使它们彼此联系、互不排斥, 形成了多姿多彩、共生共荣的民族事象。然而,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 许多民族村寨正在消失、不断地边缘化。例如, 贵阳市花溪河沿岸, 过去共有48个布依族村寨, 如今已经所剩无几。2009年, 国家民委与财政部开始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项目。经过多年努力, 贵州有效保护了一批典型的民族特色村寨。根据规划, “十二五”期间, 贵州在保护与发展民族特色村寨中, 重点进行了500个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 这为“十三五”进一步推进贵州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对其中100个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特色村寨所开展的调研看, 这些村寨都凸显出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自然环境优美

贵州民族特色村寨自然环境优美, 生态建筑林立, 是人与自然和谐相依、共生共荣的天然佳居。大多数民族特色村寨都呈现出自然成局视觉效果, 无论是具有民族性的特点, 还是

作者简介: 罗剑,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和民族文化。
委托项目: 本文为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项目“贵州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具有区域性的特色,大都不是主动布局而刻意呈现出来的,几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温暖湿润的气候,险峻雄奇、瑰丽神秘的喀斯特地貌高原地貌和自然景观,山岭处处见苍翠,河谷蜿蜒百花香,使贵州民族特色村寨拥有优美自然的环境。^①同时,大部分民族特色村寨面貌古朴、民族风情浓郁,人文景观令人神往。贵定音寨、罗甸大井、兴义纳灰、贞丰纳孔等布依族特色村寨均坐落在河谷和平坝地区,依山、傍水、靠田,周围丛林茂密,绿树环抱,翠竹掩映。寨中古树参天,或古柏、或古银杏、或古榕树、或古香樟。寨前田畴纵横,溪河环绕,流水潺潺,水车缓缓转动,垂柳依依,小桥掩映,一派美丽的山水田园风光。布依族特色村寨的地理环境都比较优越,其居住地区大多是风景名胜之地,例如黄果树、龙宫、花溪、红枫湖、茂兰、樟江、小七孔、大七孔、万峰林、万峰湖、马岭河、双乳峰等等。长期以来,黄果树大瀑布的壮美,龙宫的神秘,花溪十里河滩的锦绣,红枫湖的壮丽,茂兰喀斯特险峻,樟江大小七孔娟秀,马岭河的壮阔,万峰林的神奇,双乳峰的奇观等,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普底彝族特色村寨,深处百里杜鹃景区之中,山川壮丽、资源丰富。黔东南苗岭山区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六洞、九洞侗族村寨,共计30多个苗侗民族村寨,由于自然景观特别优美,文化内涵异常丰富,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贵州高原苗岭山区,苗村侗寨星罗棋布。西江是全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现有1258户、5600多人,99%是苗族,素有“千户苗寨的美称”。西江苗族人民在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己浓郁的民族风情。较具盛名的有西江木质干栏式吊脚楼群,大都依山而建,层层相叠、鳞次栉比,被建筑界赞为“民族建筑之瑰宝”。雷山县郎德苗寨是最有特色的苗族村寨,是贵州名副其实的民族村寨博物馆,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当地的芦笙舞,板凳舞久享盛名,村寨山青水秀,田园风光,青石小路,吊脚楼依山鳞次栉比。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村寨大多是依山傍水,村寨周围竹林古树环绕,果木葱茏,寨内村脚鱼塘触目皆是。聚族而居,一村居住十几户、几十户,多则上百户,同血缘的村寨相毗连,多为同一宗族,杂姓聚居者较少。房屋排列纵横交错,多为“干栏”式建筑。板告水寨坐落在苗岭山脉的大山脚下,都柳江旁,全寨六十多户人家,大多数是韦姓,被誉为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

二、民族古寨众多

贵州民族特色村寨中有为数众多建造于明清时代的少数民族村寨,形成贵州最具民族特色的古建筑群落。例如苗族的雷山郎德上寨古建筑群、松桃寨英古建筑群和新寨古建筑群,布依族的兴义南龙古寨、镇宁高荡村布依古寨、开阳马头寨古建筑群、花溪镇山村古建筑群,侗族的天柱三门塘古建筑群,水族荔波水浦古建筑群,仡佬族的务川龙潭村古建筑群等等,历史悠久,环境优美,原有风貌保护完好,是“原生态”文化的典型,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紧密结合的载体,已被分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①吴军.贵州民族村寨一幅纯美至真的画卷[J].中国民族.2012年第一期。

位。这些古建筑无论是建筑环境、布局、用材、造型,还是建筑工艺、功能、习俗,都独具特色。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高荡村布依古寨,始建于明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全寨300多户,1500多人,均为布依族。古寨保存极富民族特色的民居、古堡、寨门、营盘、石拱桥、古井、学堂、大水沟等古建筑,以及水车、水碾、铜鼓坪等文物古迹等。兴义南龙布依古寨也始建于明代,古寨位于兴义市巴结镇万峰湖畔,田畴纵横,古榕参天,郁郁葱葱,是一个美丽迷人的布依古寨。寨中房屋按九宫八卦形排列建筑,巷道环环相扣,道道相通,布局非凡,堪称奇迹,不熟悉的人进入其中如进迷宫。360棵古榕树盘根错节、参天耸立、奇崎虬劲、千姿百态,把古寨包围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200多座布依杆栏式吊脚楼若隐若现。明朝末代的流亡皇帝朱由榔在此休整练兵,留下巍峨的点将台和宽阔的演兵场等历史遗迹。每逢民族节日或重大活动或有贵客远来,南龙村民男女老少在寨门列队、八音齐奏、长号长鸣。古寨的山水、树木、楼居,以及布依人的农耕生活组合成了一幅美丽天然的水彩画,向世人展示其独有的神秘和魅力,呈现出一派安静、祥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

贵州大多数民族古村寨中既有村民私人的家庭生活空间,又有公共的信仰和文化活动空间。贵州民族特色村寨中的公共建筑,是贵州明清古建筑中最为耀眼的部分。如苗族的龙船棚、铜鼓坪、芦笙堂、妹妹棚,侗族的鼓楼、风雨桥、戏楼等等,都突出体现各自的民族特点。铜鼓坪、芦笙堂是苗族村民“吃鼓藏”、“过苗年”身着节日盛装隆重祭祖时,跳“铜鼓舞”、“芦笙舞”必不可少的文化活动现场。侗寨鼓楼作为侗族村民共建共有共用的集社会、文化、交际于一体的多功能建筑物,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江增冲鼓楼建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侗寨鼓楼。风雨桥因桥廊上遍施彩塑彩画又被称为“花桥”。鼓楼、风雨桥集中分布在黎平、从江、榕江一带。侗寨的风雨桥极具民族的特点,不仅是水上交通设施,还有多方面的用途。修在村头的风雨桥,不仅起着“锁水”、“拦龙”、“护寨”作用,还是村民迎来送往、款待宾客唱“拦路歌”、喝“拦路酒”的热闹场所。有些侗族风雨桥,在宽敞明亮的桥面长廊中修建鼓楼式亭子,形成鼓楼与风雨桥结为一体的雄伟建筑物。

①

三、建设因地制宜

贵州多山地丘陵,各民族特色村寨和传统民居的建设大多因地制宜,或依山傍水,或开阔朝阳,或靠大路驿道、交通关隘,或处于河谷溪峡,或处于平坝田园、阡陌纵横,或隐藏、或显现,村寨类型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各民族在村寨和民居建设中,风水观念都很浓厚,讲求村寨民居建筑与山水等外部环境的关系,通常都是根据自然地理形势和不同的地形地貌进行合理选址、规划、布局,以及单体建筑的设计和构建等。从自然生态、建筑技术角度出发,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是古代民居建筑的优秀特征和经验。处于山区则利用坡地,既节省土地,又能造成村寨建筑群高低错落的优美气势。处于水边则利用河道,组成水网交通,利

①吴正光.贵州明清古建筑民族特色浓郁[N].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9日。

②周慧.贵州传统民居建筑的环境自然生态观[J].贵州民族研究,2007(3)。

用山与水的自然优势条件,进行规划布局,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各民族在寻求居住环境时,通常都是背山面水,负阴抱阳。背山可以阻挡冬季寒风,前方开阔可以得到良好的日照,可以接纳夏日的凉风。四周山丘可以提供木材、燃料,山上的植被既能保持水土流失,防止山洪。流水既保证了生活与农田灌溉用水,又适宜水中养殖。贵州各民族的传统民居基本都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村落民居的整体环境布局,满足人们长期的基本生活需求,以求子子孙孙,世代兴旺。^②

虽然大多数村寨都是依山就势,自然成局,但有的村寨人为的规划特点也很突出。例如,黔西县钟山布依族彝族乡猫山村平寨布依族古寨,整个寨子的空间是按照五行八卦来进行布局的。现有的两百多户人家,仍有一百多户老房子,整个村寨的基本布局保存完好,建筑构造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全寨房屋连片构筑,没有孤零的人家。寨子内部石巷道相互连接,纵横交错,家家相通,户户相连,形成“点、线、面”结合的防御体系。每户人家的外墙相互连接,形成自然的巷子,磊砌巷子的石头采用干砌法,没有使用任何粘合剂,且排列有序,其中暗藏的指向符号,只有本寨人知道。过去,如果没有本寨人的引领,外人是无法自由出入寨子的。

各民族传统民居建筑用材也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但制作讲究,工艺精美,融入了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强调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和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注重物质和精神是双重需求。黔东南州的苗族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吊脚楼,这得益于苗岭山区盛产木材,村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施用,师承自然。建造的苗家吊脚木楼,架构临空,虚实结合,稳重和谐,飘洒轻盈。镇宁扁担山布依族村寨,村民就地取材,以石建房。整村整寨不见一砖一瓦,房屋四周用石块砌墙,石块奠基,石板砌墙,石片盖顶。就连生活用具也多为石头制作,如碓、磨、钵、槽、缸也全是用石做成,室内间隔也以石砌成。石屋一般依山而建,沿着山坡自下而上,层层叠叠,布局井然有序。有的石屋房门朝向一致,一排排并列;有的组成院落,纵横交错;有的石屋有石砌围墙,有石拱门进出。寨边竹林、树下安置着石凳、石椅与石桌,可供休憩、娱乐。布依族石头寨的典型特色,以致于使人们误以为布依族民居就只是石板房。

四、民居风格各异

贵州民族特色村寨民居建筑类型多样、风格各异、历史悠久、工艺独特、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鲜明。就布依族特色村寨来说,虽然其民居建筑都以“干栏”式建筑为主要特点,但各地的民居风格又不尽相同。花溪镇山、镇宁扁担山以石板房为主,田坝地区的布依族村寨,民居建筑又多为木架板壁青瓦房为主。而兴义南笼、开阳禾丰马头寨,又都是历史悠久的布依族古寨。南龙古寨是一个集优美自然风光、浓郁民族风情和神秘布依建筑于一体的古寨。寨中房屋“干栏式”建筑的风格特征非常突出,数百年来,寨中的干栏式建筑坏了就拆,拆了又建,但始终保持着原有的建筑格调。布依族民居多姿多彩,从居住环境看,有水边民居、坝子民居、河谷民居、山地民居等。从民居建筑看,有石板房、木架房、茅草房、夯土房、

吊脚楼。从房屋结构看，有穿斗式、抬梁式、绑扎式；从墙壁装修看，有石头墙、木头墙、泥土墙、竹子墙。石头墙，有石板镶嵌、石块干砌、卵石垒砌等多种。就全省而言，虽然各民族的建筑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但各民族民居建筑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仍然非常鲜明，各民族都有各民族的民居风格和特点。比如许多民族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木结构穿斗架、小青瓦屋面，但建筑的布局和细部结构还是很不相同。而一些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就更为突出和明显了，如苗族、土家族村寨的吊脚楼，侗族村寨的鼓楼和风雨桥等特色都非常鲜明。

各民族也因所居住地域环境不同，民居风格各异。例如，苗族多居住在山区，山高林密，就地取材修筑民居，黄土墙黑瓦房和古香古色的吊脚楼便成为苗族民居的主要式样和风格。苗家的吊脚楼飞檐翘角，三面有走廊，悬出木质栏杆。吊脚楼通常分两层，上下铺楼板，壁板油漆发光。栏杆雕有万字格、喜字格、亚字格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悬柱有八棱形、四方形、下垂底端、常雕绣球、金瓜等形体。楼上择通风向阳处开窗。窗棂花形千姿百态，有双凤朝阳、喜鹊闹海、狮子滚球等。铜仁市石阡县的楼上古寨，整个古寨的布局呈现一个“斗”字，风格奇特。全寨住户有150多户人家，547人，均为侗族。古寨坐东北面西南，依山而建，其整体布局为“寿”字形结构，所有巷道均为青石铺就。青石板两旁，是清一色的青瓦木屋，且都是明清建筑。寨中拥有一大片古树，由紫薇、丹桂、红枫、柏树组成，这些古树在300年以上。其中最为奇特的有七棵高大挺拔的古枫树，呈“北斗七星”状分布。古寨以“北斗七星”古枫为中心，划分为四个不同功能的分区。其东南象限为生产区，西南象限为居住区，西北象限为娱乐区，东北象限为墓葬区。古树林边的高坡上建有梓潼宫和戏楼。梓潼宫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供奉圣像四尊。戏楼始建于清朝末年，专演木偶戏。家家户户的木窗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图案有喜鹊、梅花、蜻蜓、蝴蝶等，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古寨的前面是波平如镜的梯田，一直延伸到廖贤河边。顺着小沟坎上的小路去廖贤河边，必经一座桥，桥名楠桂桥，建于明末崇祯二年（1629）。村寨道路的构造像一个古体的“斗”，“斗”字的起点是一幢三合院的中心点，结束点为寨子的水源天福寺古井。全村的天然雨水和生活用水，顺着“斗”字型的水沟汇入廖贤河，注入乌江。这样的布局，既有利于取水，有利于防火。

五、建造工艺精湛

贵州民族特色村寨大都林立着许多巧夺天工的生态建筑，特别是保存较完好民族古寨。例如，“吊脚楼”、“石板房”，就是贵州苗族、布依族用智慧创造的结晶。生活在喀斯特地区的布依族民居，从基础到墙体都用石头垒砌，屋顶盖上天然生成、厚度相同的石片，朦胧中房顶有鱼鳞之美。石板房很讲究装饰，装饰的花样很多，一般多用于基础、墙体、阶梯、院坝、晒壁、门窗、石凳，以及挑瓜、屋面等，都精锤细凿，雕刻出各种装饰图案、线条等。每个图案和线条符号，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有的寓意福禄吉祥，有的寓意家族兴旺发达等。粗糙原始的石头，在布依人看来，是纯朴坚固的象征，用它来构筑家园，根基稳固，一颗颗不安的灵魂就有所归宿，有所寄托，这是一种典型的生态民居。石板房的地基和墙体使

用的黏合剂，一般是用石灰浆，重要部分用糯米或猕猴桃的藤根水制作成的黏合剂，这在贵州建筑史上是一种特殊而又历史悠久民族传统技术工艺。

侗族鼓楼更是一种楼、塔、亭、阁巧妙结合的多层木结构建筑，榫头衔合，不施钉铆。鼓楼层数全是奇数，悉以杉木为材，巍峨壮观，气势恢弘，外观很像一棵大杉树，令人赞叹不已。黎平肇兴堂安侗寨，是最有代表性的侗族特色村寨，为典型的溪洞人家。堂安侗寨形成于明初，全寨共160余户，800多人。村寨三面环山，一面是空旷的梯田，视野广阔。木制吊脚楼的多层建筑群依山就势建造在山腰间，鼓楼耸立，楼房悬空吊脚，井然有序。四面青山，峰峦叠嶂，清泉四溢，梯田层叠，阡陌纵横。寨中通道均为青石板路面，四通八达，径曲通幽。全寨共有九条出寨子的路口，都建有寨门。寨子中的附属设施，如谷仓、禾晾、石碓榨油房、水碾、井亭、鱼塘、祭萨塘等建筑物古朴典雅，都具有侗族的独特文化个性。寨子中间，还有一块墓地，有坟十余座，多为清代所建，雕龙刻凤，卷草花纹等工艺精美，是堂安侗族文化遗产的另一种体现。村寨的每个角落，都蕴藏着深厚的侗族文化内涵。鼓楼与戏楼、歌坪形成三位一体，显示出侗族村寨的突出特征，是侗族建筑中最具特色的民间建筑之一。鼓楼、风雨桥等标志性建筑，做工精湛，结构严谨，端庄典丽，雄伟壮观，技艺精湛。鼓楼的单鼓重檐结构，少则三层，多则十几、二十几层。鼓楼形状像宝塔又像亭阁，雄伟壮观而又玲珑雅致。鼓楼平面多角形多为偶数，正方形、六边形、八边形，蕴含着侗族文化中和谐、完美的特质与祝福。整个鼓楼为纯木结构全部用合抱杉树凿榫而成，拔地而起，不用一钉一铆。鼓楼下宽上窄，由八根大杉木柱支撑，层叠而上。檐角飞翘，或四角、或六角、或八角。瓦檐上对称地塑有龙、麒麟、凤凰、孔雀、鱼、鳖、雄狮、鹿等象征吉祥和幸福的动物，还有的生动地塑着各种形态，或舞蹈或渔耕的人像，色彩艳丽，造型古朴灵动。横椽上也绘有线条清晰流畅的图画，或人物故事，或鸟鱼花草等装饰彩画。鼓楼是侗乡的一大奇观，堪称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一朵奇葩。风雨桥又称花桥，与鼓楼一样整座建筑也不用一钉一铆和其它铁件，皆以质地耐力的杉木凿榫衔接。其结构多采用中国南方特有的穿斗式的组合结构，既有古代百越族干栏式建筑色彩，又有汉族宫殿式的艺术。桥面上的亭阁建筑精巧优美，桥的两端台亭为斜山式，中央台亭为钻尖式、亭倚式，集中了侗族传统建筑中三种基本造型于一身。亭面上下均为飞角半拱，背面的瓦顶设有古朴的装饰物，亭面、桥廊均画有各种装饰图案。亭、廊、阁、栏的处理独具匠心，既注重桥梁的整体性，又注重满足行人过桥、休息、乘凉、眺望等功能的要求。每座风雨桥都既有飞龙腾空之势，又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意。鼓楼、风雨桥，这种不费一钉一铆的建筑，充分凝聚了侗族人民的智慧。

六、文化积淀深厚

贵州民族特色村寨是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是少数民族人文精神、劳动智慧、审美心理的集中体现。贵州民族特色村寨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悠远流长，蕴藏着较高的美学元素。特色民族村寨中的古民居、古建筑等是各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物化的、活态的传承，可以说，一个民族古村寨就是一个民族的一段历史，一栋古建筑就是一个民族